



大家小书

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史学遗产六讲

白寿彝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史学遗产六讲

白寿彝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遗产六讲 / 白寿彝著. — 2 版.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1.5

(大家小书)

ISBN 978 - 7 - 200 - 08675 - 1

I. ①史… II. ①白… III. ①史学—基本知识—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0398 号

责任编辑 阎慰鹏 莫常红

责任印制 王 雪

装帧设计 北京纸墨春秋艺术设计工作室

· 大家小书 ·

史学遗产六讲

SHIXUE YICHAN LIU JIANG

白寿彝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7.5 印张 128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2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08675 - 1

定价: 24.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序 言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

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前 言

瞿林东

本书是白寿彝先生论史学遗产的代表性著作，其中所收录的六篇论文，写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撰于1961年，其余五篇撰于1981—1982年，前后相隔二十年，而其撰述旨趣显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拥有连续不断和丰富厚重的史学遗产。所谓史学遗产，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前人在史学活动中的创造和积累，是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把史学遗产从历史遗产中“分离”出来，并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白寿彝先生的这几篇文章不仅开其先河，而且从理论上和研究对象上奠定了探讨这一领域的学术基础，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研究史学遗产的方法。关于研究对象，作者从

七个方面作了概括，即归纳了史学遗产中的主要成就，并将其比喻为一个个“花园”。这就是：中国史学上有关基本观点的遗产，包含历史观、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遗产；历史编纂学遗产；历史文献学遗产；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历史启蒙书方面的遗产。关于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作者指出：① 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② 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③ 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人们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自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新史学》对中国古代史学进行激烈的批评后，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代史学始终处于不被重视以至被否定的地位。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撰写此文，这在当时不仅要有学术上的见识，而且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五篇文章，集中讨论了四个问题，即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关于历史观点问题，作者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史学上关于历史进程的看

法、关于地理环境的看法、关于社会经济的看法、关于得失成败的看法、关于有民主思想内容的看法。作者继《谈史学遗产》之后，再次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以前，中国史学上是否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问题。从作者的观点来看，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他也指出，这些问题需要作长期的讨论。

《谈历史文献学》和《再谈历史文献学》这两篇文章，是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撰写的。这两篇文章不仅可以相互补充，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有些问题上思考的轨迹。在《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指出了历史文献学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利用历史文献，使我们的历史工作在文献方面具有良好的条件，这就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用处。”在《再谈历史文献学》一文中，作者提出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设想，指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①理论的部分；②历史的部分；③分类学的部分；④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从这四个方面着手来建设历史文献学，是作者的一个重要的创见。其中，关于“理论的部分”，提出了“历史文献学的多重性”问题；关于“历史的部分”，

提出了历史文献同历史时代的关系；关于“分类学的部分”，提出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与目录学有一定的区别，即前者“有统观全局的要求”；关于“应用的部分”，认为可以包含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这些论点极大地开阔了人们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解和认识，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史书的编撰》一文，反映了作者的历史编纂学思想。文章全面地评价了中国传统的各种史书体裁，指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联系，以及前人在对史书体裁的认识方面留给后人的启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第一次提出了“综合体”史书的概念并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要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作者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正是在这一撰述思想指导下进行并获得重大成功的。

《谈历史文学》一文，首先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学”的含义和性质：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如写人物、写

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优良的传统。继而作者从史文的运用上举《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为例进行论述，并有广泛的涉及；又从理论上举《史通》、《日知录》的有关论述作进一步分析。在讲到文与史的关系时，作者的这一段话是值得格外予以关注的，这就是：“是否有这样的作品，既可以说是历史书，又可以说是文学书？”“《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既是历史书，也可以说是文学书，但究竟是历史书。它们是历史书，而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水平。但确实有一些书，同时具备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性质，而不好说它主要是属于哪种性质的。如《盐铁论》、《世说新语》等就是这样的书。但这样的书毕竟不多。”这些见解，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书和文学书的界限是有帮助的。作者撰写这篇文章，除了阐述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外，还有一个鲜明的旨趣，就是为了说明这样的道理：“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对于历史学成果走向社会并广泛传播，进而充分发掘历史学的社会功

用，是大有裨益的。

通观全书，《史学遗产六讲》是作者从理论上对中国史学遗产进行系统的发掘、爬梳的开创性成果，反映了作者恢弘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书中对史学遗产之精华所作的分析及其在当今史学事业中之价值的阐释，其真知灼见，在在多有，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来说，尤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来说，既是入门之书，又是指导之书，成为人们走进史学遗产这一辽阔繁茂的园地，从而走进宏伟庄严的史学殿堂的一条路径。

本书作者对《史记》有精深的研究，为世所重，所撰《〈史记〉新论》和《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两文，卓尔不群，成为《史记》研究的传世之作。现以其附录于本书，一则可以进一步窥见作者对史学遗产之“细部”研究的精深，再则也可以帮助读者通过认识《史记》这部书去体味史学遗产的丰富底蕴。这或许可以收到从宏观到微观，再从微观到宏观之双重感受的学术佳境。

北京出版社编辑、出版“大家小书”，可谓立意新颖而又颇具学术眼光。《史学遗产六讲》（附：《〈史记〉新论》）收入其中，对“大家小书”和广大读者，都是很有意义的。出版社嘱我为此书撰写一篇前言，一是对所

收文章略作介绍，二是也谈谈我的一点认识。这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当是一个“温故而知新”的过程。

2003 年 11 月 1 日撰于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目 录

谈史学遗产	(1)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35)
谈历史文献学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	(53)
谈史书的编撰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	(73)
谈历史文学	
——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	(92)
再谈历史文献学	(112)
附：《史记》新论	(127)
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	(200)

谈史学遗产

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医药学遗产和戏曲遗产的整理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个是蓬蓬勃勃，一个是万紫千红。历史遗产的其他方面，如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化学、建筑、机械、音乐、舞蹈、雕塑、绘画、文学、哲学等等的整理工作，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祖国史学有长期的历史，有浩瀚的典籍，它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丰富的。但我们史学工作者注意一般的历史遗产比较多，注意史学遗产还很不够。这篇小文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促请同志们多注意一下。

我认为，在努力开拓史学工作的新园地、提高不断耕耘的质量的同时，适当地分出一些力量来研究史学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新史学是有意义的。我想，这至少可以得到下列的几种好处。

第一，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

自殷商“有册有典”以后，国史的编修大权主要是掌握在奴隶主国家和封建主国家的手里。在封建时代里，官史没有不咒骂农民起义的，没有不把对农民的镇压写成神圣的“正义”行动的，而又往往把官兵对老百姓的残杀掳掠写在起义农民的账上。改朝换代了，回护本朝的短和夸大前朝的罪恶和错误，这就成了新修史书的一个政治任务。如果在封建割据的时期，不同割据集团的史书就会互相对骂起来。

也有进步的或有进步倾向的史学家写出了触犯统治集团利益的东西，他这个人或他的这部书就要倒霉了。司马迁揭了封建统治者的疮疤，他的《史记》就不如班固的《汉书》在当时易于流传。东晋的孙盛写了一部《晋阳秋》，揭了桓温的底，触怒了这个当权的人物，他不得不另抄一个副本寄存辽东以防书稿的毁灭。清初的庄廷铨案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书狱。只因触犯了清廷，庄氏的墓被发掘，他的尸骨被烧成灰，他的父亲、兄弟和侄儿，编书、刻书、卖书和其他被牵连的，共有七十多个人被砍了头。

一切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受作者历史观的支配。不同的历史观，归根到底，总可以从不同的阶级利益上得到解释。但历史观在反映阶级利益的时候，往往是错综曲折，不一定明显确切。再加上史学传统的继承性，就使我们对于史学遗产进行阶级分析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但也正因为这样，研究史学遗产才更有意义，才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史学

在现实斗争中的具体特点。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先秦的历史著录，如甲骨卜辞、钟鼎文字、《尚书》、《春秋》、《竹书纪年》、《世本》等，表达的形式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纪王公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单篇，就是连续的片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纪传体的撰述较多，后汉史有十一家，晋史有十二家。而名人传记可考者近二百家，姓氏书有七八十种。唐中叶以后，大部头的通史相继出现。清代是考据多，地理书多，注释辑补改作旧史的书多。为什么在不同时期有这样不同的特点？这一定有它们的规律。

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春秋战国之际，《春秋》这部书写成了，总结了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汉在武帝时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统一，司马迁写出了一百三十卷的《史记》，总结了自传说中的黄帝以至武帝时的历史。唐代中叶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有了较多变动的时期，刘知几写了《史通》，总结了前人编写历史的经验，而杜佑写了《通典》，总结了唐中叶以前的典章制度。北宋结束了五代的纷争，司马光主编了到五代为止的《资治通鉴》。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

的变局，马端临编撰了《文献通考》，王夫之写了《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编撰了《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样的传统也不能单从形式上来考察，它也必然有跟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相结合的具体规律。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例如《文献通考》这部书，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排比材料的书，不能跟杜佑《通典》之“剪裁镕铸、成一家言”者相提并论。不同意这种说法的，也不过认为《通考》的资料丰富，便于撷取。其实《通考》更值得注意的地方是